

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政治民主化

——亨廷顿的民主理论评析

陈 炳 辉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亨廷顿在考察分析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 深入研究了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具有正相关性, 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但是经济发展又不是导致政治民主化的唯一因素, 文化传统对民主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他认为新教文化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而儒教文化传统则妨碍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本篇论文是对亨廷顿的民主理论的初步探讨。

[关键词] 亨廷顿; 经济; 文化; 民主

[中图分类号] D261.3

[中图分类号] A

[中图分类号] 1673- 5684(2007) 03- 0026- 05

亨廷顿在其20世纪90年代的新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为《第三波》)中, 是把政治民主化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他把19世纪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运动划分为三大浪潮, 主要考察分析了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 对这一民主化浪潮的产生原因、转变过程、基本特征、直接后果及其走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深入讨论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政治民主化的相关关系。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相关性

民主化问题是20世纪政治学中的热点问题, 是政治发展理论中最被关注的问题之一, 许多西方学者都对民主化发生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探讨。所谓民主化指的是一个国家从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或转型的过程, 现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化的原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亨廷顿总结了当代西方学者解释民主化原因的各种理论, 把引起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20余项变项。他认为, “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 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

解释上述这些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几乎是注定不成功的, 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迥异。”^{[1](46)} 亨廷顿认为, 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变项)足以解释所有国家或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 也没有一个因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各种原因结合的结果, 产生民主的原因因国家不同而异。第一波、第二波及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的原因各不相同, 各种因素(变项)在民主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时因地而不同。尽管如此, 亨廷顿依然认为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密切相关, 尤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经济发展的因素对政治民主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影响政治民主化的20余种变项中, 相当多的变项是由经济发展直接带来的, 经济发展通过其中的某些变项而直接影响了民主化的进程。亨廷顿强调指出, 因为经济发展并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条件, 所以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这个社会的政治民主化, 尽管如此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1](48)}

[收稿日期] 2007- 06- 03

[作者简介] 陈炳辉(1950-), 男, 福建莆田人,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国家学说的教学与研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代西方政治学者一般都相信民主政治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关,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大。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和教育,有利于建立民主制。”^[2]达尔也认为“一种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它所造成的社会,它所引起的,为它所特有的经济增长,这一切对于发展和维持民主政治制度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条件。”^[3]亨廷顿坚持了现代西方政治学者关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观点。通过经验性的归纳,亨廷顿认为在全球范围内,民主与财富之间有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而多数的民主国家也是富裕国家,虽然富裕国家并非都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也并非都是富裕国家,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89年在人均收入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高收入国家中,除了3个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新加坡外,其余的20个高收入国家均为民主国家。而42个人均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的低收入国家,除了印度和斯里兰卡外,基本上都是非民主国家。

亨廷顿认为,民主化的国家、亦即从非民主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国家,一般是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1](70)}亨廷顿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看做是中间地带,将其称为“转型带”(transition zone),这些转型带国家内部会形成一种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要求政治民主化。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入中等经济发展水平,进入转型带时,它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从1950年至1975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以每年3.4%速度发展,尽管各国发展的差异很大,但总体上的高速增长使许多国家跨入了中等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了过渡的转型带,在各国内部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经济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正是前20年的经济发展的产物。将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看作是向政治民主化过渡的“转型带”国家,这是亨廷顿根据对民主发展的经验性归

纳和研究所得出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独特结论。

二、经济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基础

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能为民主政治创造有利的基础和条件,能引起并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对此亨廷顿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其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复杂多样和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对于威权政权来说越来越难以驾驭。经济发展会造就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这就要求分散决策权,这些都会促进民主化的发展。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社会上其它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那些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的资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们要求一个自己能够施加影响的民主政治制度,要求一个不被个别军人、政变集团或独裁者完全支配的政治体制。其二,经济发展不仅会促进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且会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经济富裕程度往往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培育了人际间的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与民主制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其三,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而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公众能够构成对民主化的支持。从1960年到1981年间,发展中国家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大增,并且有更多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的文化、态度、性格是有利于民主的。其四,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使得各社会集团间有更多的资源可分配,这会促进融合和妥协,政治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游戏,妥协宽容得到提倡,这是符合民主精神的。其五,经济发展要求社会的贸易、投资、技术、旅游和通讯的对外开放,这会使社会越来越多地接受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解决的冲突,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带来国外工业化世界的民主化的影响,从而冲击封闭的政治体制,使其转向民主化。其六,尽管经济发展常常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期看经济发展将导致更平等的收入和分配。民主与彻底的经济平等(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但民主与经济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经济发展最终会降低经济财富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助于民主的出现。

最后,亨廷顿还认为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民主化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发展会促进中产阶级

队伍的扩大,而中产阶级则是民主化的最积极的支持者。亨廷顿认为在贫富悬殊的地方,存在着贫困的多数与少数富裕寡头的激烈对抗,民主不可能行得通。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的人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现代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民主政治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因此,在第三波的民主化运动中,“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中产阶级。”^{[1](77)}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是1984年反马科斯运动中的主人,也是此后的阿基诺运动的支持者。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主运动中,同样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构成了结束全斗焕政权的主要力量,推进了韩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西班牙、巴西、秘鲁等国,中产阶级都在结束威权统治推进第三波民主化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反之,在一些中产阶级相对规模较小较弱的国家,如缅甸、苏丹等国,民主化就不成功。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介于极富和极贫之间的中产阶级是共和政体(亦即温和的民主制)的基础,“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为民主的政体。”^[14]而亨廷顿根据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运动的现实,进一步说明了中产阶级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三、新教文化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实现

尽管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发展是导致民主化的唯一因素,并不把民主化看作完全可以由经济发展来决定。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民主化的一些基础,为民主化创造了某些可能的条件,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满足民主化的所有充分条件。虽然财富与民主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是富国并非都是民主的,新加坡无疑已达到富国的水平,但在亨廷顿看来它并不是民主国家;而穷国也并非都是独裁的,印度虽然是一个地道的贫穷国家,但在亨廷顿看来它却是民主的国家,象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已处于相当富裕的水平,照理应该是民主国家了,但当时却还不是。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等国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2000美元,属于中等经济发展的国家,但当时它们都不是民主化国家,只是在80年代末情况才有所改

变。

经济发展尽管是引起民主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项,但是它却并非是引起民主化的唯一变项,换句话说,仅仅有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能直接引起民主化。在前述的20多项引起民主化的变项中,除了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变项外,还有文化的、传统的、政治的、国际影响等其它的变项。事实上,亨廷顿在对第三波民主化原因的探讨中,虽然特别注意分析了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而是从合法性问题、宗教变革、国际影响等几大方面探讨了民主化的原因,对引起第三波的民主化的原因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在其分析中,也特别注意到了文化传统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

现代西方学者,特别是以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理论倡导者,在其研究中也非常重视文化因素对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作的影响。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就指出:“文化的同质性(基本共识)或异质性同民主的相关性,目前已得到相当充分的确认。”^[15]亨廷顿指出,在对第三波的民主化进行分析时,“有必要引入文化因素,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1](120)}在《第三波》中,亨廷顿认为经济和文化是影响政治民主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所有文化因素中,他又强调了宗教因素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影响。在他看来,世界的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中,只有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关联。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出现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至1988年,以基督教或新教为主要宗教的46个国家中,有39个是民主国家,而58个以其它宗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只有7个是民主国家。亨廷顿认为新教与民主具有最直接的联系。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新教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民主。20世纪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其首尾一贯的伦理基础都是在禁欲主义清教的伦理中找到的,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6]而20世纪末,亨廷顿则在《第三波》中,力图揭示新教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关系,论述了新教信念是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文化基础。

其一,从宗教信条看,新教教义强调个人的良心,强调个人对圣经的自由理解以及个人对上帝的直接信仰,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是有利于民

主的。传统的基督教将罗马教皇看作上帝的代表,上帝对教徒的拯救是通过教皇和教会进行的,教徒只有服从教会、教皇的指示,靠各种“善行”“事功”才能得救。马丁·路德提出的宗教改革理论,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只有内心真正信仰上帝才会有善良的行为,才能获得上帝的拯救。从而确立了以个人信仰自由为基础的新教教义,个人的良心、理智成为信仰的基础。这样,个人主义就以信仰的形式表现在新教教义中。亨廷顿将个人主义的坚持看作是现代民主的文化基础之一,包含着个人主义倾向的新教被视为是有益于民主的。

其二,从教会组织看,新教教会自身在组织方式上也更为民主,强调教友的至上性,同时没有主教或者只有权力有限的主教,这就不同于具有严格等级的威权性质的天主教组织,亨廷顿认为新教组织自身所具有的民主性质当然有利于世俗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宗教改革运动主张废除从教士、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到教皇的严格的等级教阶制度,废除教会中神职人员的特权,新教教会是由平等的教徒自愿结成的组织。加尔文主张按照民主原则健全教会组织,甚至神职人员也是通过教徒的投票选举产生的,教士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即使是教会首脑也必须服从信徒组织的大会的决定。这种教会组织显然具有民主的色彩,恩格斯在著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导言中指出:“加尔文的教会的组织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主吗?”^[7]亨廷顿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倒是同恩格斯一致的,新教本身具有民主化色彩的组织形式,显然有利于世俗国家的民主化,在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中,自然比较容易确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

四、儒教文化传统妨碍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亨廷顿认为新教社会的文化传统是有益于民主的,而儒教社会或受儒教影响的社会是不适合民主的。在东方,只有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有民主,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在日本,中国的儒教价值已经被重新解释,完全日本化了,与日本的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那已经不是纯粹的儒教了,因此日本的民主并非是儒教文化影响的结果。在菲律宾则基本上不存在儒教传统,它完全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主要受天主教的影响,

因此,菲律宾的民主也与儒教文化不相关。而作为具有浓厚的儒教传统的新加坡,却是唯一没有实行民主政治体制的高收入国家。亨廷顿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新加坡是儒教传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儒教所体现的价值观、信念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儒教的文化取向会阻碍迈向民主的步伐。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了儒教是不利于民主的。

儒教强调团体胜于强调个人。儒教文化弘扬为“公”的思想,为“大家”、为“公家”才是高尚的,而个人则被视为“私”,“自私自利”是卑贱的。推崇“公”而冷落“私”的儒教价值观,在亨廷顿看来就是张扬集体主义而忽视个人主义。而亨廷顿认为现代民主是以个人主义的坚持为基础的,强调个人的权利。儒教的价值观显然与此相矛盾。

儒教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权威的传统在政治上必然要求强人的统治,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权威的统治,这样才能保证稳定的秩序、防止社会动荡和混乱。儒教中不具有追求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自由甚至被视为冲突、混乱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民主是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的儒教信念是不利于民主的。

儒教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儒教传统不讲权利和义务(责任)的统一,从中难以产生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现代公民观念。这种文化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甚至把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作为上面的恩宠。亨廷顿认为现代民主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的,没有个人权利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儒教的传统是与此相悖的。

儒教强调和谐与协作胜于强调分歧与竞争。在儒教传统中对秩序的维持、等级的尊敬具有核心的价值,在这种秩序中的和谐、协作是美好的。而各种思想、团体的分歧、冲突和竞争则被视为危险的、不合法的,只会导致争吵、动乱的社会局面。现代民主恰恰是扎根在社会多元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充满各种思想、团体的自由竞争,民主政府是在反对党的骚扰、限制中存在并运作的,而儒教却排斥这种分歧和竞争。

儒教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中。“儒家社会缺少抗衡国家之权利的传统。”^{[11] (364)}社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缺少自治的社会机构来同政治国家相制衡。亨廷顿认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是现代

民主的重要基础,一个相对分离的市民社会构成了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现代民主需要市民社会和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把社会融化在国家中的儒教传统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

儒教把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合一。亨廷顿借用林毓生的话说:“传统的中国,没有把神圣与现实区分开来,没有把精神与世俗区分开来。”^{[1](365)}在西方,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政教逐步分离,宗教是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精神权威。而中国的儒教并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而是整个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国家(皇帝)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力量,儒教没有把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区分开来,而现代民主恰恰是建立在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分离的基础上的。

亨廷顿探讨宗教与民主的关系,实际上是要说明文化传统的因素对政治民主化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影响其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亨廷顿对宗教与民主的关系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政治发展进程、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更深入的认识,显然具有其合理的价值。但是,当亨廷顿把民主完全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视为新教文化的产物时,他是把西方民主作为唯一的模式,而这一点却是令人怀疑的。

经济发展是有助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这是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总结中得出来的一条通则。我们同样可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的。20余年来,中国有着世界公认的高速度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的过度的控制得以放松,决策权得到了分散,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这些显然有利于民主化的发展。“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1](4)}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中国民主化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亨廷顿认为经济发展会促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民主化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而然的实现。经济发展只是使民主化成为可能,它并非是实现民主的充分条件。民主化的实现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亨廷顿探讨了文化传统,特别是宗教因素对民主化

的影响。在亨廷顿看来,新教的文化传统是有助于民主化的,而儒教的文化传统则是不利于民主化的。应当看到,在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中国政治文化中那些与民主不相容的东西确实需要加以改造,需要确立起有利于民主化的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观念,构成对民主化支持的公民文化。民主化的实现更需要政治领袖和人民大众的努力,而不能以中国经济发展不够为借口,不能以中国缺乏民主的文化传统为借口,放弃民主化的努力,不能妄想坐等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某一天,民主化就会自然降临。应该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适宜地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美]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 [2] [美] 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5.
- [3] [美] 达尔.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67.
-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206.
- [5] [美] 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94.
- [6]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6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1.

(责任编辑:牛 君)